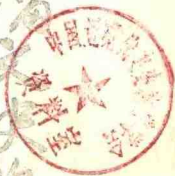


15.03



臨江府志
資料選輯



第三輯

86

临淄文史资料选辑

1984/19

第三辑

中国人民
政治协商会议

淄博市临淄区委员会编

一九八六年七月



布泉(王莽时期货币)



存史



資政

刘庆文 篆刻

目 录

- 营丘考.....郑杰文 (1)
- 女诗人左棻.....李 剑、宋玉顺 (20)
- 贞观贤相——房玄龄.....宋玉顺 (32)
- 清初科学家薛凤祚.....袁兆桐 (33)
- 郑铤与其《荣城记事歌》.....李庭萱 (58)
- 谈临淄的旧县志.....刘绍华 (65)
- 郎家庄东周殉人墓.....张龙海 (72)
- 淳于意墓.....刘庆文 (78)
- 秦汉时期临淄的通行货币业与铸币业
.....张继彬 (86)
- 临淄最早的中学——临淄县立初级中学
.....于晋才、赵永岗 (92)
- 对西关小学的回忆.....王升甫 (98)
- “南庙会”学潮记略.....王 毅 (105)
- “九·一八”七周年歌...李人凤遗作 (108)
- 五路口“八仙戏”的探析.....李庭萱 (111)
- 日军在矮槐树村一带的暴行
.....赵得寸、戴士烈 (121)

“八十垂垂直钓翁，
鹰扬轻背奋秋风；
白头清渭无穷意，
谁遣飞熊入梦中。”

马季常咏太公诗，录自清康熙十一年《临淄县志》。

姜太公的事迹，是家喻户晓，妇孺皆知的。据《史记》记载：“太公望吕尚者，东海上人。……本姓姜，从其封姓，故曰吕尚。”

“吕尚盖尝穷困，年老矣。以渔干（葜）周西伯（文王），西伯将出猎，卜之，曰：‘所获非龙非𪚩，非虎非𪚩，所获霸王之辅，’遇太公于渭之阳。与语大悦，曰：‘……吾太公望子久矣’，故号之曰太公望，载与俱归，立为师。”“武王平商而王天下，封师尚父于齐营丘。”

这一诗句，便是这段史实的反映。今由周明琛同志书为本辑扉页，用以表这人们对他的崇敬和怀念。

又北，径其城东。城临淄水，故曰临淄。
……武王以其地封太公望，赐之以四履，都营丘为齐。”（《水经·淄水注》）。

唐李吉甫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十在临淄县系下著录说：“古营丘之地，吕望所封之都也。……营丘在县北百步外城中”。

《尔雅》曰，淄水出其前，经其左曰营邱。今临淄城中有邱，淄水出其前，经其左，故曰营邱。

唐孔颖达曰：“太公股肱周室，成王封之于营丘，今临淄是也。”《春秋左传正义》卷三，顾师古态度较暧昧。他在注《汉书·地理志》“临淄”条时，赞同巨瓚之说：“瓚说是也。”然在“营陵”条下，又异引应劭、巨瓚两说，而曰：“临淄、营陵皆曰营丘也。”莫衷一是。

延至清代，持论者较多。栖霞人郝懿行力主“营丘即临淄说”，征引《毛诗正义》、《史记集解》、《檀弓正义》等书证之，并驳斥应劭“营陵即营丘说”。俞樾亦持是说：“齐都营丘，淄水过其南及东”（《诸子平议》）。昌乐人阎愉则力主“营

陵即营丘说”，从地貌特征、地理位置、传统习俗、经济特点、开国之道诸方面，论证昌乐营陵古城即太公始封之营丘（见清·嘉庆《昌乐县志·艺文考》）。

至今，这一笔墨官司仍无定论，故《辞源（修订本）》、《辞海·地理分册（历史地理）》、《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》等皆两说并存。

但从有关记载和地理形势等方面看，营丘当在临淄。

我们先来看一下史书的有关记载。

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云：“武王已平商而定天下，封师尚父于齐营丘。东就国，道宿行迟。逆旅之人曰：‘吾闻时难得而易失。客寝甚安，殆非就国者也。’太公闻之，夜衣而行，黎明至国。莱侯来伐，与之争营丘”。从这段话可以看出：司马迁认为营丘在齐地内，故言“封师尚父于齐营丘”。齐的得名，与临淄南部牛山西的天齐渊有关。酈道元《水经·淄水注》云：“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齐所以为齐者，即天齐。渊名也。”另从司马迁的话还可看出：营丘为

军事重地，故周王朝封姜尚于此以镇东方。当时，山东半岛的莱国十分富强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曰：“莱夷作牧，厥排栗丝”，可见蚕丝业和畜牧业是很发达的。若营丘在昌乐的话，距莱统治中心较近。那早为莱国吞占了。而从距离上来讲，营丘应在临淄。临淄距莱国统治中心较远，又有淄水作为屏障。所以莱侯与太公争营丘，才没有取胜。太公才得以“至国，修其政，因其俗，简其礼，通商工之业，便鱼盐之利。”才得以“民多归齐，齐为大国”（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）。

关于姜尚的受封，还有另一说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云：“周成王时，薄姑氏与四国共作乱。成王灭之，以封师尚父，是为太公”。薄姑氏及四国作乱被灭，将其地封姜尚太公，意在使太公镇之，这同武王在殷旧地封管叔、蔡叔、霍叔的用意是一样的。那么封地必在薄姑附近。薄姑，在今博兴县境内。临淄距薄姑只有数十里，而昌乐距薄姑数百里。

按营丘古属青州，商时为逢伯陵方国

所辖，周时为齐国都城，这在我国史书和地图上都是这样著录。例如蒋廷赐：《尚书地理今释》说：“史记武王封尚父于齐，都营邱。正义云，营邱在青州临淄北百步外城中。今山东省青州府临淄县西北三里，有营邱城是也。”清和州鲍东里古村编辑：《史鉴节要便读》卷一说：“齐封太公（齐今山东青州府，太公姜姓吕氏名望号尚父），国于营丘”（地在今临淄县）。

可见，从史书关于姜太公受封的记载来看，营丘应在临淄而不在昌乐。

下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史书关于姜齐两次迁都的有关记载。

姜太公被封于营丘后，“及周成王少时，管、蔡作乱，淮夷畔（叛）周。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：‘东里海，西至河，南至穆陵，北至无棣，五侯九伯，实得征之’。齐由此得征伐，为大国，都营丘”（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）。可见姜齐原建都于营丘。后来，周夷王时，齐国发生了两次迁都。由于齐国邻国的纪侯的诋毁，周夷王烹死了齐哀公，而立姜静为齐胡公，胡公迁都

薄姑（今博兴）。“哀公同母少弟山怨胡公，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攻杀胡公而自立，是为献公”（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），古人作战是兵车步卒，远袭最难。秦国老臣蹇叔曰：“劳师以远袭，非所闻也，师劳力竭，远主备之。”（《左传·僖公三十二年》）。假若营丘在昌乐，昌乐距薄姑数百里，战车步卒数日才能到薄姑，袭杀必难成功。假若营丘在临淄，临淄距薄姑数十里，几小时便可到达，所以才能一袭而杀胡公。

齐胡公时，薄姑东邻纪国。纪，姜姓侯国，都城在今寿光县南。临淄齐故城东北。齐襄公八年（公元前六九〇年）始为齐所灭（见《左传·庄公四年》）。纪国鄫邑，在临淄齐故城正东十八里，齐襄公七年（公元前六九一年）才有“纪季以酆入于齐”一事（见《左传·庄公三年》）。纪国鄫邑，在今临淄县东南（见《春秋·庄公元年》杜注），齐都城东南方，齐襄公五年始被齐迁其民而并其地（见《春秋·庄公元年》）。可见，齐胡公时，纪国城邑在薄姑

东的淄河东畔，南接鲁中丘陵，北至渤海之滨，象一条屏障横于营陵与薄姑之间。若营丘在昌乐的话，姜山袭击胡公时，必定要向纪侯借路。不向纪侯借路，战车是不能来到薄姑的。况且薄姑和营陵（昌乐）又隔潞水、淄水等大河。若营丘在临淄，便正在薄姑东面而纪国西边的淄河西畔，袭击薄姑时才不用借路，取得袭杀成功。

我们再来讨论一下，胡公为什么从营丘迁到薄姑，献公为什么又从薄姑迁到临淄，临淄和营丘是什么关系。我们说，这两次迁都的主要原因，都在于各自的势力所在地不同，迁都是为了巩固各自的统治地位。司马迁叙述这事时说：“献公元年，尽逐胡公于，因徙薄姑都，治临淄。”“尽逐”，是怕胡公党羽作乱。逐后还不放心，所以才“因徙薄姑都”。可见薄姑是胡公的势力所在地。事实也正是如此。后来厉公暴虐，故胡公于复入齐时，也是以薄姑为跳板的（见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）。我们再来讨论齐献公迁都到哪里呢？他也必然效法胡公，从利于巩固自己的统治出发，迁到自己的势力

所在地。他的势力所在地是哪里呢？当然是营丘了。“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攻杀胡公”便是最好的证明。可见，献公迁回的地方仍是原国都营丘，只是迁都回来后，将营丘改名为临淄。郦道元对这个问题有精辟的见解：“献公之徙，其犹晋氏深冀名绛，非谓自营陵而之也”（《水经·淄水注》）。民国九年《临淄县志》说：“献公复都营丘，拓大其城，更名临淄”。

以上，从史书中关于齐国两次迁都的记载中，可看出营丘当在临淄。

下边，我们再来看几种零星的历史记载。

据《左传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汉书·地理志》的记载来看，东莱统治中心在今黄县。又，莱有棠（今即墨县）、夷维等城邑。夷维地名，刘敦愿先生考曰：“夷维的维，疑是淮字，此邑属莱夷而在淮水附近，所以称夷维”。以此推之，营陵应属古夷维地名。这是营陵非营丘的又一佐证。

齐桓公时，“既反侵地，正封疆，地南至于陶阴，西至于济，北至于河，东至于纪

鄆，有革车八百乘，择天下之甚淫乱者而先征之”（《国语·齐语》）。桓公任用管仲，国富兵强，“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”（《晏子春秋》）。为五伯之首，即反侵地，疆土向东才到鄆邑（今临淄齐故城东十八里），远距鄆邑数百里的营陵，在太公时不可能是齐地。

《左传·僖公十四年》载：“春，诸侯城缘陵（营陵旧称——笔者注）而迁杞焉”。杜注“缘陵，杞邑。辟淮夷，迁都于缘陵”。此为齐桓公四十年事，正值齐强盛之时，若缘陵为太公始受封地，必不容忍此为“杞邑”，更何况建都呢？又，周敬王时，孔子弟子后处封于缘陵，唐时追封为营陵伯（据《昌乐县志》）。周敬王时，齐国是景公在位，用晏婴为相，齐二次复盛。此时诸侯并起，周室衰微，位同诸侯，若营陵为齐地，怎容周王封给别人？

据《左传》昭公二十年》载：晏婴与齐景公在临淄齐城外讨论古乐时说：“昔爽鸠氏始居此地，季荝因之。有逢伯陵因之，蒲姑氏因之，而后太公因之”。那么太公封地

怎能不在临淄，而远在几百里外的昌乐？

从以上有关历史记载可见：营陵非营丘，营丘不在昌乐而在临淄。

下面，我们从地理形势考查一下。

在冷兵器战争的初期，地形地势的便利与否，对战争的胜败具有重要作用。前面说过，关于太公受封的记载有两说。一是《史记》：“武王已平商而定天下，封师尚父于齐营丘”，依此说，周王封吕尚的目的在于藩卫王室。当时，“周初定，未能集远方”

（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）。莱夷是东方强国，周之劲敌。其封地必是进可出击，更重要的是退可固守的军事重地，姜尚才能在无周王朝援助的情况下，完成藩卫王室的任务。另一记载是《汉书》：“周成王时，薄姑氏与四国共作乱。成王灭之，以封师尚父”。依此说，其目的在于弹压薄姑一带。《竹书纪年》云：非功臣不足以“弹压东方，故特封之营丘”。这样，其封地也必须利出击便固守。可见，不管是哪一说，营丘都必须可攻可守，特别是利于固守，姜尚才能完成周王朝的使命。事实也正是如此，在姜尚“夜

衣而行，黎明至国”时，“莱侯来伐，与之争营丘”。仓促应战的姜太公所以能保住营丘，营丘的利于固守是重要原因，那么，下边我们就先看一下昌乐和临淄，哪里能具有这种固守的地理条件。

古临淄，东有淄水向北注入济水（小清河）；北有济水；西有时水（乌河）经麻大湖注入济水；南面是鲁中丘陵，有牛山、稷山、黄山等天然屏障。淄水从鲁中丘陵中流出。时水源头（今临淄矮槐树村东）距鲁中丘陵的北缘——黄山五里，但“山西有涧，下道（导）于时，非经雨潦则涸，故名乾时”（见民国九年《临淄县志》）。乾时，即今辛店发电厂东边大武水库上下的河道。雨季，潦水从山谷中冲出，切开坚硬的棕红土，劈成一条深几十米，宽二十几米的陡立的河沟，极易防守，公元前六八五年，齐国和鲁国在这里进行了一场大战：“夏，公伐齐，纳公子纠，桓公自莒先入。师及齐师战于乾时，我师败绩，公丧戎路，传乘而归”（《左传·庄公九年》）。新即位的桓公不但没被鲁师攻入国都，反而能大败鲁

师，乾时的地势是一个重要因素。由此可见，临淄基本是一个三面环水，一面靠山的天固之地。更加上在这块天固之地内，临淄齐故城北，济水南，有秦始皇和汉武帝都曾游幸过的巨淀湖这一古代大湖。齐故城西，是一片低洼的河网密布（有涵水、泇水、系水等）的沼泽地，即《水经注》所说的“九里十八湾”之处。山、河、沼泽地，对临淄的固守造成了极为有利的地势，姜太公才据此在迎击莱夷的战斗中获胜。

另外，莱夷是东方强国，是姜太公最重要的敌手。营丘必须首先具备防东莱的最有利的地势。临淄东面紧傍淄水，淄水源出原山之阴，沟通九条大山谷，有十数条河流注入。《尚书·禹贡》：“海岱惟青州，嵎夷既略，淮淄其道”。足见淄水古为大河。淄水北出鲁中丘陵，经古天然水库天齐渊，紧傍稷山、牛山入鲁北平原。平原处河道窄处也达里余，宽处竟达数里，两岸陡立，皆十余米高，今河底已积存七、八米厚的砂石，可想见当时浩大的水势。《晏子春秋内篇·杂上第五》：“景公登东门防，民单服然后

上。公曰：‘此大伤牛马矣，夫何不下六尺哉？’晏子对曰：‘……蚤岁溜（卢文绍诂曰：溜，溜字之误）水至，即下六尺耳，向者防下六尺，则无齐矣……’。”元于钦《齐乘》引《齐记补》一书说：“（齐）故城周五十里，高四丈，十三门。”雨季如此，旱季则有天齐渊调剂。这样的大河巨川，足以防东来之敌。

临淄古城东墙，打破西周时城墙直修的惯例，紧压淄水西岸，曲折修筑，呈十二处拐角，既不美观，又费工。可想见筑城者怕留下缓冲地带，为东来之敌攻城时所利用，西有意为之。筑城尚如此用心良苦，选地则更应“陟则在岵，复降在原”。“逝彼百泉，瞻彼溇原，乃陟南冈，乃覲于京”

（《诗经·公刘》），四处相看，八方求索了。天固之地临淄被太公选中，就不足为怪了。

所以，从地理形势看，营丘在临淄是合适的。

我们确定了营丘是在临淄，那么在临淄什么地方呢？臣瓚云：“今齐之城中有丘，